

信息技术越先进,公民隐私越危险?

张田勤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帕提诺23日对外证实,美国“监控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已向该国提交申请。

“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后会出现什么走势以及斯诺登的最终命运如何,都涉及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大问题,即人类设计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如何与技术互动,是前者控制后者并促进技术向良性发展,还是后者摆脱前者的控制而让人类文明走向歧途——公权力通过技术无孔不入地监控公民的一举一动,并维持其专横甚至邪恶的统治。

早在1943年,刘易斯·芒福德出版《技术与文明》时,就把跨越长距离的瞬时通信归纳为新生代技术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它包括有线和无线通讯的电报、电话以及电影和录音。芒福德当年凭直觉认为,

为,新生代技术尽管有很多优点,但带来的危害似乎要大于其优点。29年后的“水门事件”,以及后来东德用无线电和窃听器监控1/3国民的行为,再到今天的“棱镜计划”,都验证了芒福德的预言。

尽管“水门事件”是一次技术对制度的僭越,但结局还是可控的,因为制度纠正了技术失控的错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三项罪名投票通过了对尼克松的弹劾:(1)尼克松亲自参与和指示其下属对“水门事件”进行掩盖,对法律的实施进行了有意的阻挠,违反了宪法赋予的职责;(2)尼克松滥用职权,以非法手段对公民进行调查打击,侵犯公民权利,违反了就任总统时的誓词;(3)尼克松无视国会要求交出磁带和其他证据的命令,严重阻碍了弹劾工作程序。

如今,从“棱镜”计划被披露的情况来看,进一步发展的现代监控技术已经在

威胁我们的文明,正在摆脱制度和法律的有效约束。

这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隐性监控的行为,一般不会让监控者有羞耻感和罪恶感,出于羞耻感和罪恶感站出来揭秘的,只有斯诺登和维基揭秘者阿桑奇等极少数人。因此,这种情况能避免出现斯塔西(Stasi,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监控计划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都陷入深深的良心自责和伦理失落的打击,甚至有一对暗中互相出卖的夫妻因此双双自杀。

此外,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棱镜计划”也更有效率。在斯塔西最为厉害和有效的时期,如果算上线人,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远高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的比例,也即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

是否接受“谢师宴” 决定权在教师

孙维国

不知从何时起,本意为感谢老师的“谢师宴”开始变味,具体表现为,“谢师宴”的价格越来越高,少则上千元,多则上万元。当下,各地高考成绩陆续放榜,新一轮“谢师宴”也将拉开大幕。不断攀升的“谢师宴”价格,必然引发相互攀比之风,当朴素而美好的师生感情被高价“谢师宴”绑架,不仅师生情变味,也会给很多同学带来负担。

我不得不得想到姑父。姑父是从代课老师转为正式教师的,迄今已经从教35年。他原来在村里教书,2000年后调到镇里的中学任教。面对“谢师宴”,姑父最初也很为难,但自从他采取了“事先告知”的办法后,就再也没有学生家长请他吃饭,他的“为难”也随之化解。这个办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学生毕业前,给自己所教学生的家长每人发一条谢绝“谢师宴”的短信,提前告知家长切勿宴请,否则,不但给孩子造成负面影响,也使本身纯洁的师生关系庸俗化。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仍有一些家长晚上跑到姑父家进行“试探”,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这样一传开,家长们都知道姑父确实不接受“谢师宴”。

我曾问姑父为什么要想出这个办法,他说:道理很简单,老师是接受请客的人,家长是请客的人,如果接受者拒绝的态度坚决,请客者再想请也无法。所以,作为老师,自身对“谢师宴”是什么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提前发短告知家长不要请客,就是在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即便有些家长起初不太相信,但有了提前告知,再拒绝不仅容易,也会让家长真正相信你。相反,如果你不提前告知,不向家长表明自己的态度,家长就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态度,面对被请客送礼歪风污染的大环境,家长就会陷入请还是不请的纠结之中。

姑父的解释没有大道理,却呈现了一个事实:面对送礼或请客吃饭,老师持什么态度,并将这种态度清晰地传递给家长和家,这十分关键。从姑父的实践看,表明态度并不难,只需一个告知短信,关键是老师愿不愿意这样做,是不是真正对拒请吃饭态度坚决。说到底,去不去参加“谢师宴”的决定权在老师,而非学生和家。

PS毕业照 是反教育行为

钱凤佳

初三学生拍毕业照留念,第一排中间却空出了4个位置,你猜,为啥?原来校长等领导当天忙于接待来调研的领导,没空拍照,只好留着空位,等待事后再PS上去。这一幕发生在广东省惠州市仲恺中学。(《南方都市报》6月25日)

又是PS毕业照!不久前,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被曝PS毕业照,网上的标题是“史上最奇葩的高中毕业照”;后来被曝PS毕业照的是宿迁清华中学,这种做法在这所中学,早已是稀松平常,“以前每年也都是这么做的”。

PS毕业照让学生“很愤怒”,“因为这探明了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不知这种作假的毕业照,将会给学生留下怎样的记忆?

和学生毕业合影,是为人师者的责任,是对学生起码的尊重,也是教育“以人为本”宗旨的体现。师生的情谊因毕业照而绵延,有关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也会因毕业照而被唤醒。可以说,学校领导、老师与毕业生的合影,其实是学生在学校上的最后一课,它会因薄薄的一张照片而永恒。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无论如何都应倾心倾力,和学生们拍好毕业照。

比如,2010年的毕业季,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用1天半时间与8000多名毕业生握手拍照,握手次数1万多。贵州大学2012届学生的毕业典礼,每一位毕业生都可以和校长合影,学校新任校长郑强站了整整7个小时,和全校8000多名毕业生合影并一一握手告别。

PS毕业照的理由,都是因为校领导“没空”,这显然不是问题的症结,因为大学校长也很忙。单看某些中学领导表现出来的对学生的傲慢和忽视,已然没有一点教育工作者的情怀。教育要培养人的健康人格,教育工作者更应以诚信为本。PS毕业照,恰恰是在作假,是典型的反教育行为。



面对“钱荒”,需忍一时之痛

覃浩俊

6月24日的中国股市,在“钱荒”中暴跌5.30%,创近4年来单日跌幅之最,不仅击穿了2000点,而且两市共有近200只股票跌停,单市值蒸发也达到历史少有的1.34万亿元。

此时此刻,“救市”的呼声再起,应属情理之中。关键是,到底该不该救市、用什么样的方式救市,这是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否则此次下跌的代价就白付了。

此次暴跌,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宏观经济数据差强人意,而且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二是银行出现“钱荒”,央行又铁石心肠,没有半点放水的意思。

前者从今年3月开始就已初露端倪,只是5月的表现更为明显罢了。这期间,PPI的表现几乎没有让人看到过希望。不过,并没有引发过股市格外强烈的震动。真正引发此次股市暴跌的“元凶”,是银行发生的“钱荒”。工商银行的ATM取款机甚至“慌”出了故障,被认为是“钱荒”的障眼法。

也正因为如此,“救市派”也就强烈呼

吁央行开闸放水,给银行释放流动性,以缓解流动性紧张的矛盾,重拾投资者信心。

显然,这是扬汤止沸、挖肉补疮式的“救市”思维,它纵然能解燃眉之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此时开闸放水,不仅不能让“钱荒”矛盾得到缓解,而且极有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钱荒”,甚至是严重的金融危机。不错,股市暴跌,股民的损失是惨重的。单市值蒸发1.34万亿元,都是股民的钱,但有没有人算过这样的账,即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5%,居民手中的钱会蒸发多少?通货膨胀带给居民购买能力的蒸发,可不是一个或几个交易日的问题,而是持续、永久的,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股民世界最多,但炒股的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而通货膨胀带来的危害,是所有人都要承受代价的。

也许有人会说,“救市”未必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要说的是,如果继续采取开闸放水的方式“救市”,必然会让陷入难以自拔的通货膨胀深渊。要知道,按照目前银行的信贷资金结构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就算此时不对银行开闸放

水,也很难保证今后不发生通货膨胀。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严重错位的银行信贷资金,要想将风险化解,最大可能就是发行货币。而发行货币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就是居民手中的钱被蒸发。

也正因如此,忍住一时之痛,承受一时之失,按照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盘活存量货币,让银行信贷资金结构得到优化,让政府债务能不再继续膨胀,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且,对股市来说,“救市”的手段也并非银行开闸放水一条道,取消印花税、降低红利税、个人所得税,组织“国家队”进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股市等,都能达到“救市”的目的。

所以,面对股市出现暴跌、股民利益受到损害,切不可因一时之需而随便对银行开闸放水,注入通货膨胀因子。与通货膨胀带给广大居民购买能力的蒸发相比,股市暴跌带给股民的收入蒸发,还是要轻得多。

当然,如果管理层能该出手时就出手,以不向银行开闸放水的手段来“救市”,让股民少受损失,也就再好不过了。

自由谈

欧洲海洋文明在衰落?(下)

王义梳

老年化是欧洲社会散漫而缺乏活力的典型写照。

“当你还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你适合去美国。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一项对匈牙利商人的民调得出这样的结论。

过去50年,欧洲统计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口,虽然所有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只是略有上升,但年龄结构已日益老龄化。1900年,世界人口的21%生活在欧洲;1950年,这一比例降至12%;2050年,生活在欧洲的人口将只占世界人口的5%。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自我享受为中心的生活习气,以及高企的失业率,导致欧盟各国人口再生产普遍不足。只有不断扩展才能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但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欧洲越来越多地将问题归咎于移民,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考虑改变人口趋势以及目前全欧洲对待移民的态度,以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欧洲能劳动的年轻人口将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没有劳动能力且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的社会开支将越来越大。

欧盟的困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由此带来的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反思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博弈的困境。欧盟是多层治理的产物,欧债危机更凸显其博弈的困境。从全球层面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参与治理欧债危机;从欧洲层面看,非欧元区国家除了英国、捷克外都签署了财政契约;从欧盟层面看,欧盟被置于解决欧债危机的风口浪尖;从欧元区层面看,发行欧元区债券的冲动一直存在;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公债是欧债危机的源头;从地区层面看,发展不平衡成了欧元区的阿喀琉斯之踵;从社会层面看,民粹主义导致各国政局动荡,对抗欧盟治理。欧债危机治理需要在这么几个层面博弈,其难度可想而知。

多重博弈之殇,又体现在政府与人民的背离。

其二是周期的错位。选举政治周期与经济发展规律不匹配,理性选择受制于感性因素,是欧债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欧元逻辑与欧盟逻辑不匹配,是周期错位的又一表现。欧元是世界货币一极,但欧元区治理受制于欧盟政治。欧盟在重大问题上实施“一致表决”通过原

则,成员国更动辄要搞全民公投,这种决策周期错位常常导致欧盟机制失灵,损害了欧元作为世界货币一极的地位。

其三是先进的落后。美国重返亚洲,欧洲很受伤害,事情本身也见证了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边缘化,反映了欧盟缺乏应对全球热点的能力与雄心。欧盟发展战略最大的失误是秉持线性进化论思维,以“贵族-仆从”关系看待世界,不愿脱下“贵族”的长袍与“仆从”赛跑,结果在竞赛中被“仆从”远远甩在了后头。欧盟倡导的包容性发展局限于欧洲内部,无力包容世界,又不愿为世界所包容。在“救助欧洲”问题上,这种内内纠结就更明显了。明明是“差钱”而有求于中国,却又指责中国收购欧洲。

其四是生产与生活的矛盾。欧债危机典型反映出相关国家生产方式与生活的不匹配。在国家层面,希腊落后的生产方式难以维系奢侈的生活方式;在地区层面,土耳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在补贴拉丁区,引发了地区矛盾;在国际层面,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以维持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其五是一体化的不确定性。丘吉尔曾这样定义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当有人在早上6点敲你门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送奶人。”换言之,民主意味着确定性和小康。如今,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西方民主不得不受牵连。无根·哈贝马斯警告:“如果欧洲一体化计划失败,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多久之后才能再次实现今天的状态。回想一下1848年的德国革命:当革命失败时,我们花了100年时间才恢复到同之前一样的民主水平。”的确,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却有共同的货币政策,这是欧债危机产生的重要体制性根源。为何不能统一呢?原因就是欧洲一体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妥协产物,不能一步到位。这与美国一开始就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和一部宪法而运作至今,大相径庭。这也解释了美欧债务危机表现迥异的制度根源。

总之,欧盟近年来的困境深刻揭示出欧盟的三元悖论:主权独立、平等和联合,不可能同时实现,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主权联合客观上削弱了主权独立性,并导致主权实质上的不平等。欧盟的困境既是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也是全球化问题在欧洲的折射。欧盟的前途不能局限于一体化,而应该在开放的地区一体化背景下,实现欧盟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的转变,通过制度创新,重新塑造欧洲的比较优势。

立志

6月24日,北大学者陈平原教授在中山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鼓励毕业生们“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认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大学生不应老想着考公务员、当官,还可以在各行各业将工作做到“登峰造极”。(《新快报》6月25日)

漫画:徐简

公平的薪酬才能缓解青年的焦虑

胡印斌

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通过搜狐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3%的人认为提升敬业度首先应该重视薪酬公平性。专家指出,在很多时候,薪酬内部分配是否公平,甚至比薪酬水平高低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更大。

初入职场,“好夕挤上车”的欢喜还没有延续多久,很多人就发现自己的薪酬待遇并不令人满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所得与所付出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也与横向比较所产生的不公感密切相关——大家干得差不多,为何有人拿的比自己要多得多?这种源于不公平而产生的职场焦虑在时下极为普遍,也极大灼伤了青年的上进心。

在前些年,还可以这样宽慰那些沮丧的青年人:别急,慢慢来,等你们有了足够资历时,薪酬自然就上去了。然而,值此一切都讲究“快”、强调“变现”的时代氛围之中,“熬资历”的旧思路显然有些过时了,青年们普遍不愿耐心等待。更何况,眼下,住房的压力、子女教育的压

力,乃至其他诸多生活压力接踵而来,很难让人完全静下心来等待。

也因此,强调薪酬公平,让每一个青年都能各安其位、敬业乐群,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不去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以“就业难,大家应该隐忍克制”为由,听任薪酬的不公平撕裂认同,伤害敬业,影响绩效,未免有些得不偿失。长此以往,还会人为制造、加剧社会上本已弥漫的焦灼情绪。

那么,究竟该如何实现薪酬公平?又该实现什么样的薪酬公平呢?

薪酬公平大抵可以从外部公平、内部公平、机会公平等方面破题。其中,外部公平多指行业之间的薪酬差异,比如,国企员工与一般私企员工的薪酬差距,公务员与企业员工的薪酬差距等,这方面的差距有目共睹,早已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议题,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关切。如何将行业间的薪酬差距控制在一定水平,既关乎民众期待,也关乎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内部公平相对来说则更具可操作性。比如,企业、单位内部完全有可能摸索

建立一套更公平的薪酬机制,其关键之处即在合理、明确、透明、竞争,强调员工的参与性。不是说员工之间不该存在薪酬差距,而是要明确这种差距产生的依据;也不是说不该强调惩罚,而是要以鲜明的正向导向引导员工努力的方向。

以往领导者习惯使用的“神秘”、“主观”做法,如果缺乏公平性的支撑,只能不断损害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精神。从而很难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则其企业发展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

此外,机会公平也十分重要。如果不给每一个员工提供同样大小的参与机会、被挑选的机会和获胜的机会,则这样的企业和单位其“成长性”必定很差。

薪酬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感受公平最直接、最深刻的触媒。有关方面在教育青年面对现实、改变心态的同时,也应以实际行动提升青年的公平感,让每一朵花都拥有绽放的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有圆梦的机会,从而增强其对单位、对社会的认同度,不断缓解焦虑,充分实现自我。

有法必依才能“同工同酬”

舒圣祥

从7月1日起,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将正式实施,其最大亮点是明确规定了“临时工”享有与用人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并赋予人社部部门依法开展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行政许可的权利。对此,很多人满心期待,但也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可能还会找空子来规避。(《南方日报》6月25日)

关于同工同酬,《人民日报》曾给出过同一个统计数据:同一个单位,干同样的活儿,聘用工和正式工、农民工和城镇工、编制外和编制内,收入甚至会差出10倍。这种二元用工体制下“按身份分配”的现象被媒体炮轰了很多年,却至今未见改变——越是公众眼中的“好单位”,越是要讲编制的“铁饭碗”,打破“身份制”,越是鼓励企业走长期用工的路子,提倡公平合理的用工环境,但是,只要有利益的存在,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就难免“不择手段”,更何况劳资本身就不平等,弱势的劳动者没有与强势的资本平等对话的权利,劳务派遣甚至根本没有与企业直接对话的空间。所谓工资集体协商至今也仅仅停留在文本上。

同工同酬,法律说到还不够,关键还要在执法上做到。收入分配改革要继续深入,同工同酬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对编制的依赖,还是各类企业对降低用工成本的追求,都决定了同工同酬不可能轻易实现,必将任重而道远。

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重新给劳动者带来了希望,但是法律的规定与执法能否做到,毕竟不是一回事。

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往往非常讲究“编制”,聘任人员与编内人员因为“身份”不同而待遇不同,这是同工不同酬的一个典型现象。某种意义上,同工不同酬正是机关事业单位“带头”搞起来的。如果要实现同工同酬,首先就要改变“按身份分配”的现象,这还要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做起。如果连政府机关都做不到同工同酬,却要求企业做到同工同酬,怎么可能?机关事业单位要打破“铁饭碗”、打破“身份制”,这既是收入分配改革不可或缺的宏大话题,具体到同工同酬同样也是前提条件。

在企业层面,同工不同酬主要体现在劳务派遣的滥用上。企业使用劳务派遣的目很明确,就是降低用工成本。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实际上也是鼓励企业走长期用工的路子,提倡公平合理的用工环境,但是,只要有利益的存在,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就难免“不择手段”,更何况劳资本身就不平等,弱势的劳动者没有与强势的资本平等对话的权利,劳务派遣甚至根本没有与企业直接对话的空间。所谓工资集体协商至今也仅仅停留在文本上。

同工同酬,法律说到还不够,关键还要在执法上做到。收入分配改革要继续深入,同工同酬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对编制的依赖,还是各类企业对降低用工成本的追求,都决定了同工同酬不可能轻易实现,必将任重而道远。